

帝俄學者丹尼列夫斯基的中國觀

Nikolay Danilevsky's View on China

張志遠 (Zhang Zhiyuan) *

尼·雅·丹尼列夫斯基 (Nikolay Danilevsky, Никола́й Яковлевич Даниле́вский, 1822-1885) 是一位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人物，其的思想體系涵蓋諸多領域並對國際關係、文化比較等方面產生了深遠影響。其中國觀作為其整體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反映了當時特定的歷史語境下俄羅斯對中國的多維度審視，值得深入探究。丹氏是俄羅斯的哲學家、自然科學家、社會學家、文化學家和達爾文主義評論家，泛斯拉夫主義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丹氏最舉世矚目的成就是其撰寫的巨著《俄羅斯與歐洲》(1869年)，¹為20世紀俄羅斯歷史哲學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該書以理解俄羅斯和歐洲相互關係為宗旨，深刻地闡釋了諸如歐洲中心論、歷史科學的直線進步論、民族和全人類的關係等重大問題，從而提出了文化歷史類型理論，並以這條紅線貫穿了其對近代中華文明認知標準。

一、丹尼列夫斯基中國觀形成的時代背景

丹尼列夫斯基中國觀形成是19世紀的產物，它是建立在特定的社會政治經濟變革基礎之上的。它的產生、發展、演變，以及其特徵、性質等都與其所處的特

定的歷史時代有著密切的關係。因此，有必要結合其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來對丹尼列夫斯基中國觀加以探究。

(一) 西方文明的擴張與滲透

丹尼列夫斯基生活在19世紀歐洲，正處於資本主義蓬勃發展的時期。這一時期正值歐洲列強全球擴張，俄羅斯也處於社會變革與對外探索的重要階段。西方工業文明迅速崛起，東方傳統文明面臨巨大挑戰。在國際關係方面，俄羅斯在歐洲列強競爭格局中尋求自身定位，同時也在亞洲地區拓展影響力，與中國的接觸和交流日益增多，這為丹尼列夫斯基觀察和思考中國提供了豐富的素材與現實背景。在經濟上，始肇於18世紀60年代的工業革命已經從英國蔓延到法國等歐洲大陸國家。即使是經濟上相對落後的德意志地區，經濟上在這一時期也取得長足的進步。在工業革命的影響下，19世紀中葉歐洲已經躍居世界之巔，將其它文明遠遠甩在了歷史時間的車輪之下。以工業革命為標誌的西方文明在全世界高奏凱歌，歐洲成為了進步的代名詞，幾乎所有的落後國家都出現如何面對西方的問題，即：學習西方和對抗西方。在完成了內部的整合與自我完善之後，現代歐洲文明進一步加快了對非歐洲文明的入侵和滲透的步伐，從而加深了歐洲文明與非歐洲文明的對立與衝

* 作者現為遵義師範學院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講師。本文係貴州省2023年度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蘇聯馬克思主義史學話語體系建構的歷史進程及啟示研究」階段性成果。

1 Н. Я. Данилевский, *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 (丹尼列夫斯基,《俄羅斯與歐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突。致使非歐洲文明被拉入到了以歐洲文明為主導的世界體系之下，非歐洲文明本土文化受到莫大的衝擊。

對於西方文明而言，俄羅斯依舊是個半開放半傳統的社會，具有極強的神秘感。可以這樣說，歐洲文明至始至終持一種異己的眼光環視著俄羅斯。面對著西方文明的擴展與滲透，俄羅斯既接受又排斥。事實上，貫穿於整個 19 世紀的西化與反西化的較量在俄羅斯依然十分強勁。需要指出的是，當時俄羅斯這種反西方和本土化的情節又不同於一般的民族主義，這使得思想界變得更加光彩奪目。在多年歷史沉澱之後，俄羅斯非西化或反西化呈現出一種即追隨和吸取歐洲文明，又自立於西方世界之外的特點。此外，俄羅斯與外部世界的關係，需要補充兩點：第一，俄羅斯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的整體民族意識受多方面的制約，一直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其居民大多數信仰東正教和具有農民習俗與地方性的忠誠，包括對沙皇的崇拜，並沒有形成統一的大俄羅斯帝國的民族主義；第二，在尋求俄羅斯獨特的發展道路上，俄羅斯所獨具的普世主義佔據重要的歷史地位，還在某種程度上制約了民族主義的發展，並且與西方相對立的因素，比如個人主義因素和非市場經濟取向大大的得到加強。

儘管西方化影響在此時的俄羅斯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從總體上說，反西化的傾向依然是有增無減。此時俄羅斯思想界反資本主義傾向佔據主導地位。² 反西化或是非西化傾向既反映了斯拉夫主義者和民粹派的思想軌跡之中，也反映在歐亞主義者和泛斯拉夫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之中。

（二）1861 年改革與俄羅斯社會轉型

所謂社會轉型就是社會諸多要素如經濟、政治、文化、價值體系在不同的社會形態之間發生的質變和同一社會性內部的部分質變或量變過程。從克里米亞戰爭結束之後，俄羅斯處於內憂外患的衝擊之下，日顯衰落的同時，俄羅斯社會也經歷了這樣一種痛苦的社會轉型

期。在 19 世紀俄羅斯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亞歷山大二世一系列改革給當時的俄羅斯社會的政治、文化、經濟生活帶來了巨大的變革。

然而，在取得社會變革的同時，歐化改革相應地也帶來了一系列社會問題。一般而言，社會變革必然與傳統社會的基礎、等級制度的破壞、社會結構的複雜化相伴隨，各種處於過渡狀態和邊緣狀態的社會階層的出現都是這一痛苦轉型期社會發展的特點。不過，西歐社會的發展比改革後的俄羅斯更協調、更自然，這是因為西歐傳統社會的內部已經形成了一些條件，如：傳統上尊重私人所有制、個人主義獨立性等等，這些條件可使西歐相對正常地過渡社會動盪；此外，歐洲國家向工業化社會過渡的時間段拉得更長，甚至到了另一個世紀，從而避免了一些列社會問題的集中爆發，使這些社會問題得以逐漸化解。改革後的俄羅斯則不同，俄羅斯用幾十年時間完成了西歐經歷數百年的社會經濟轉型，也就是把西歐數百年間產生的社會問題在俄羅斯數十年內總爆發。

其結果可想而知，俄羅斯在整個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幾乎在各個領域都可以發現社會的斷裂或對立：一方面是效仿歐洲文明的長期努力，另一方面是難以擺脫的東方與半東方的傳統；一方面是高速發展的城市工業與快速發展的市場經濟因素，另一方面是貧困落後的農村與頑固封閉的村社經營方式；一面是孤芳自賞或孤軍作戰的知識份子，另一方面是意識上與之相隔絕的基層民眾，尤其是高高在上、專制主義的沙皇政權與苦難的廣大民眾之間的矛盾日益尖刻，孕育著時刻都會發生的全社會結構性危機。此外，在俄羅斯人的內心精神世界，也存在著這樣相應的二元對立。俄羅斯著名學者別爾嘉耶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ердяев）指出，³「在俄羅斯人身上可以發現矛盾的特性：專制主義、國家至上和無政府主義、自由放縱；殘忍、暴利傾向和善良、人道、柔順；新手宗教儀式和追求真理；個人主義、強烈的個人意識和無個人的集體主義；民族主義、自吹自擂與普世主義、全人類性；世界末日——彌

2 米羅諾夫，張廣翔等譯，《俄羅斯社會史》下卷（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頁 335-340。

3 別爾嘉耶夫是 20 世紀最有影響的俄羅斯思想家，1874 年 3 月 6 日生於基輔。一生共發表有 43 部著作、500 多篇文章，《俄羅斯思想》一書最為廣為周知。

賽亞說的宗教信仰和表面的虔誠；追隨上帝和戰鬥的無神論；謙遜恭順和放肆無禮；奴隸主義與造反行動。」⁴此二元性特徵從而造成俄羅斯在這場變革中不可避免地帶有獨特的個性，從而引起了思想界的高度關注，並深陷其中。

（三）社會思想領域的空前活躍

總所周知，19世紀俄羅斯迎來了文化的黃金時代、白銀時代，文學、藝術等領域取得非凡的成就，社會思想領域空間活躍是其重要表徵之一。這一時期的俄羅斯文化已經完全擺脫了吸收外來的西方文化單向模仿期，而是在西方文化和本土文化相互融合的基礎上創造出具有獨特民族特色的新文化，成為世界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留有濃厚的一筆。

在這期間，在社會思想領域最引人關注的莫過於斯拉夫派和西歐派關於俄羅斯歷史發展道路的大爭論，這場歷史性爭論的主題是「俄羅斯與西方」問題。與西方派主張俄羅斯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相對立，斯拉夫派強調俄羅斯歷史道路的特殊性。俄羅斯思想界空前活躍，誕生了一大批思想家，如：霍米亞科夫、基列耶夫斯基、阿克薩科夫兄弟、薩馬林、科舍廖夫、切爾卡斯基、齊若夫、瓦盧耶夫、波波夫等等，從而形成了一股社會思潮，帶給沉寂的俄羅斯思想界一股清泉。

這場爭論的意義極為深遠，它的主題「俄羅斯與西方」問題一直貫穿俄羅斯歷史發展道路的始終。至今仍為失去其原有的光澤。在蘇聯解體後的新俄各個不同流派關於俄羅斯未來發展方向的爭論中，依稀可以看到這一時代的影像。尤其是斯拉夫派的思想對後世影響最為深遠。作為俄羅斯精神獨特性的代表，斯拉夫派思想家在後來俄羅斯思想發展的各個階段都能迴響起嘹亮的歌聲。

丹尼列夫斯基的思想受到多種思潮的影響。一方面，俄羅斯本土的斯拉夫主義思想在其的觀念中留下深

刻印記，強調俄羅斯文化的獨特性與自主性，這種思想傾向也延伸到其對中國文化的理解中，使其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從非西方中心論的視角看待中國。另一方面，當時流行的歐洲文化進化論等思潮也促使其對不同文化包括中國文化在世界文明體系中的地位進行思考與比較，試圖構建一種更全面的文明發展理論。

二、文化歷史類型理論是丹尼列夫斯基中國觀的理論基礎

《俄羅斯與歐洲》一書創作時期正值克里米亞戰爭結束，俄羅斯屈辱地簽下了《巴黎和約》，沙皇政府痛定思痛、立志改革、破舊立新，全俄陷於對歐洲的仇視和失敗的反思之中。正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1869年丹尼列夫斯基在《曙光》雜誌上發表了《俄羅斯與歐洲》，真可謂是為久旱的俄羅斯大地送上一場甘露。《俄羅斯與歐洲》一書加上前言、附錄共計550頁、由17章組成。此書1871年出版了單行本，但通常被稱為「第一版」的則是1869年連載於《曙光》雜誌上的第5、6、8、9期上。

該書一經出版，便受到俄羅斯學界的廣泛重視，但多被冠以保守主義和斯拉夫主義代言人的稱號，並加以批判。伴隨著《俄羅斯與歐洲》在1888、1889、1895年的連續再版，丹尼列夫斯基及其學說成為俄羅斯學界爭論的熱點，成為當時人們談論的焦點，並形成了兩種截然相反的態度，即：一方以俄羅斯著名學者丹尼列夫斯基追隨者斯特拉霍夫（Страхов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為代表的肯定派；⁵另一方則以索洛維約夫為代表的否定派。⁶雖然此書作為斯拉夫主義的聖書在斯拉夫世界廣泛傳播，但是卻不太為其其地域所知。在德國，當斯賓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的《西方的沒落》一書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問世，⁷並產生了強烈的轟動效應的時候，丹尼列夫斯基著《俄羅斯與歐洲》

4 別爾嘉耶夫，雷永生譯，《俄羅斯思想》（北京：三聯書店，2004），頁3。

5 斯特拉霍夫，也音譯為尼古拉·斯特拉霍夫，是俄羅斯哲學家、公關家、記者和文學評論家。

6 弗拉基米爾·謝爾蓋耶維奇·索洛維約夫（1853-1900），是俄國著名的宗教哲學家、詩人、政論作家。

7 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德國著名歷史學家，歷史哲學家，歷史形態學的開創人。

一部分被譯為德文，於 1920 年出版，並未受到廣泛的關注。20 世紀 40 年代，由於美國社會學的創始者索羅金（Pitirim A. Sorokin）的介紹，⁸ 丹尼列夫斯基被作為斯賓格勒德先驅者而廣為學界所知。⁹ 二戰後，比較文明研究在日本興起，以伊東俊太郎、神川彥松、梅棹忠夫為代表的日本學者紛紛著書立說，部分學者從學術系譜和學理維度，對斯賓格勒是比較文明論先驅者這一觀點提出質疑，後經日本高野稚之、勝田吉太郎、堤彪等學者的介紹，丹尼列夫斯基及其學說遠播日本。¹⁰ 然而，此時的蘇聯，由於受到僵化的教條主義影響，對《俄羅斯與歐洲》的研究變得毫無生機，僅在個別的詞典中方可見到，直到 60 年代才略有起色，但將其視為以反動的思想家。¹¹ 直到 20 世紀 80 年代中葉，在自由主義史學思潮普遍回歸的影響下，有關丹尼列夫斯基研究的著作才相繼推出，進而推動了《俄羅斯與歐洲》的再版，文化歷史類型理論也重新被學界所認可。¹²

開篇伊始，作者便開宗明義闡述了對歐洲在 1853 年克里米亞戰爭和 1864 年普魯士丹麥戰爭中截然相反的態度表現出了強烈的抗議及深層次的分析，進而指出歐洲敵對俄羅斯的立論；並提出俄羅斯文明既不屬於東方也不屬於西方，及俄羅斯獨特性的觀點；進而從政治、宗教、文化、歷史發展進程等方面對俄羅斯與歐洲進行比較，指出俄羅斯與歐洲是完全不同的文化歷史類型；同時又對俄羅斯 19 世紀面臨國內外的一系列重大

問題，如：彼得改革以來的歐化問題、東方問題等進行了論述，其觀點可謂獨到，發人深省；此外又提出了泛斯拉夫聯盟的政治構想；最終得出俄羅斯既不屬於西方也不屬於東方，俄羅斯為獨特的斯拉夫文化歷史類型的結論。

在《俄羅斯與歐洲》中，除以上述及內容外，其最為核心內容當屬丹尼列夫斯基文明理論，筆者將其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丹尼列夫斯基指出各種文化歷史類型的發展，並不具有統一的模式。在以上 10 種類型劃分的基礎上，進一步將登上世界歷史舞臺的文化歷史類型區分為「單一（或孤立）型」和「繼承（或持續）型」。中國和印度屬於前者，而埃及、巴比倫尼亞、腓尼基、希臘、羅馬、希伯來、歐洲則屬於後者。¹³ 為了闡述文化歷史類型的繼承性，丹尼列夫斯基採用了土壤的比喻。指出「繼承性」文明的特點在於，該文明的活動成果是作為那塊土地的給養物質，或者說作為肥料來傳播（即那些容易吸收和同化的物質）出現的，在這塊土地上應該發展後續的類型。丹尼列夫斯基進一步解釋到，正是由於有了埃及和腓尼基對希臘發揮作用，希臘對羅馬產生影響，才有了羅馬和希臘對德意志—羅馬語系的歐洲的影響。無論是單一型的文化歷史類型，還是繼承型的文化歷史類型都是世界歷史舞臺不可或缺的類型形式，兩者人類歷史的兩個不同的側面，並以此促進人類歷

8 索羅金（又譯素羅金），美籍俄裔著名社會學家。20 世紀 20 年代移居美國，曾任哈佛大學社會學系主任，著有《社會和文化動學》等。

9 Sorokin P. Social philosophies of an Age Crisis. Boston. 1951; Sorokin P. A. 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today. N.Y., 1966.

10 詹可夫斯基著、高野稚之譯，《俄羅斯思想家和歐洲——俄羅斯思想家的歐洲文化批判》（東京：現代思潮社，1973）；勝田吉太郎，《近代俄羅斯政治思想史》（東京：創文社，1961）；堤彪，《丹尼列夫斯基——比較文明論的理論先驅》，《共立藥科大學研究年報》，1978 年，第 21 號。

11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 т. 13, 1952;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 т. 5, 1960;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 т. 16, 1963. Гайденок П.П. Наперекор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у прогрессу. //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1974. №5; Протопопов М.А. Кладбищен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 Дело. 1982. №6; Пустарнаков В.Ф. Концепция культур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типов (локальных цивилизаций). // Цивилизация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прогресс. М., 1983.

12 Банков С.И. Идеальная борьба вокруг философск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доктрины Н.Я. Данилевского // Из истории религиозн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в России XIX – нач. XX вв. М., 1990; Важинский В.М.. Историософская концепция Н.Я. Данилевского // История-Философия-Культура, Историко-философские чтения, посвященные 40-летию Липецкой области, Липецк, 1994; Корнеев И.В. Н.Я. Данилевский 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 Социум. 1995. № 1.

13 丹尼列夫斯基，《俄羅斯與歐洲》，頁 103。

史發展的多樣性。還需進一步強調的是，這些類型的存在，其本身也是進步的。

其次，丹尼列夫斯基提出了文化歷史類型盛衰存亡的四個階段，即：民族時期（或部落時期）、國家時期、文明時期、衰落時期。按照丹尼列夫斯基的觀點，每個文明期大約延續 400 至 600 年。其舉例說，就希臘的情況而言，從西元前 5 世紀初至亞歷山大學派活躍期結束，文明期延續了約 600 年。就羅馬的情況而言，從希臘衰落至西元 3 世紀前，文明期延續了約 400 年。猶太人的情況與上述情況相類似，從掃羅時代至最後的預言者時代結束，文明期延續了約 500 至 600 年。丹尼列夫斯基還指出，與文明期相比，部落或民族志時期則延續時間之長經常以千年為單位。這一時期是民族的意識和能量得到蓄積，民族的個性或特殊性成型的時期。在這一時期，民族的個性，如語言和神話的世界觀，以及敘事詩般的傳說，相對於外部自然和其民族的自我存在的基本形態等，在許多方面得到了體現。在丹尼列夫斯基看來，部落時期的民族具有「很強的柔性和機體的韌性」。這時期的民族很容易加入到各民族間的聯繫中，或者融入其中，或者加入到更多的部落之中。各民族就要開始或多或少地失去原始的部落獨立性，從這種依附性中獲得解放，以此來代替「已經斷送的原始的自由」。

丹尼列夫斯基又進一步指出：這種依附性的作用對民族是不大有利的，因為它能克服「部落的不受約束的力量」，使其服從於總目標的個人利益，使其更富柔軟性，這樣就必須戰勝這種依附性。丹尼列夫斯基解釋到，只有那些超越了歷史規律和各種依附形式（奴隸，納貢，封建主義）的禁欲主義者的流派才更有能力捍衛國家的獨立性，這種獨立性對於文明歷史的發展是必要的。不過，按照丹尼列夫斯基的觀點，為了保證對其它民族的統治就需要不斷服從個別意志。在部落群體中除了有組織的大民族外，「還有逐漸並不自覺地被某些歷史上重要的民族同化的眾多部族，如：腓尼基人、韃靼

人、薩莫耶德人、奧斯加克人，還有巴斯克人和凱爾特人，這些部族或者發生分化，或者被其他民族同化，成為多樣化的歷史現象」。丹尼列夫斯基肯定地指出，這些形成中的民族只能成為最高民族隨意處置的元素。¹⁴ 如果將民族志時期視為蓄積的時代，那麼文明期就是消費的時代。丹尼列夫斯基認為：這種能量的蓄積不管如何豐富，不久就會消亡。文明的活動期越是劇烈，文明越是難以擺脫過早衰竭的命運。文明如達到它不可超越的限界，就會進入生活的停滯狀態，它的進步也就停止了。文明不可能有無限的進步和朝著同一個方向無止境的發展，到了一定時期，文明必然走向衰落。¹⁵

再次，丹尼列夫斯基對偉大的文化歷史類型與周邊民族之間互動進行了進一步的解釋。

丹尼列夫斯基以太陽系做比喻，指出：「在人類世界中，不僅有行星，同時還有彗星、隕石及其它宇宙物質形式。」¹⁶ 將人類歷史上民族的命運劃分為：第一，形成於積極活動中「偉大的民族」，構成了獨立的文化歷史類型；第二，「臨時出現的現象」（匈奴人、蒙古人、土耳其人）的民族；第三，沒有「任何肯定或者否定的歷史作用」的民族。

以此為基礎，丹尼列夫斯基進一步分析了偉大的文化歷史類型與周邊處於不同發展狀態民族之間的互動關係。丹尼列夫斯基稱野蠻民族為「積蓄自己民族力量的保管員」。這些民族積極的加入到了世界歷史的發展進程之中，「保存了自己民族的歷史力量」。與生長於民族學機體內的早期民族相比，處於強大的外殼保護下，成為強大民族的後備力量。¹⁷ 從表面來看，這些民族是同時期調節主要文化歷史類型之間關係的被動客體，但是在歷史發展中，它們常常是處於後備力量狀態的間接見證人，但在必要時立刻就變成「偉大的民族」，或是在吸取了過去的文化歷史類型養分的基礎上，從而形成了新的文化歷史類型。不管是獨立的文化類型，還是已經衰落的文化歷史類型，或是以「民族志的素材」的形式存

14 丹尼列夫斯基，《俄羅斯與歐洲》，頁 346。

15 同上註，頁 81。

16 同上註，頁 90。

17 同上註，頁 437。

在，為其民族服務的民族，其在人類歷史進程中註定要扮演的角色並非是預定的。既有從「民族志的素材」變成文化歷史類型乃至文明的破壞者或建設者的情況，也有從文化歷史類型淪落為「民族志的素材」的情況。

最後，丹尼列夫斯基從歷史事實和文化歷史類型的變遷中發現，當時依存於「歐洲中心論」的世界觀，以及歐洲文明普遍性的傳統的世界歷史三分法，即將世界歷史劃分為古代、中世紀、近代的斷代方法，無論從事實還是從理論上看，都是沒有根據的。例如：將西羅馬帝國的滅亡，和與之幾乎毫無關係的存在併發展的印度和中國的命運，以及在此之前已經衰亡的埃及和希臘的命運聯繫在一起，塞進同一個古代史的框架中，完全是不合理的。在經過不同歷史階段的不同社會的歷史，都在古代史中被塗上一種顏色的反面，相同的日耳曼羅馬各民族的發展過程，卻被分成中世紀和近代兩個階段。這在丹尼列夫斯基看來，同樣是一種恣意的行為。如果順從這種不合理的「人為的」時代劃分，那麼就不可能對歷史和歷史現象取得充分的理解。丹尼列夫斯基主張，對人類歷史確切而真實的理解，只有通過對其本身「自然的」秩序、對各種歷史現象加以區分，才有可能獲得。而文化歷史類型就是進行這種區分的基本單位。因為各種各樣的歷史事件和歷史現象是在不同的文化歷史類型中表現出來的。只有屬於同一文化歷史類型的歷史事件和歷史現象，才可能具有互為關聯的意義。同樣道理，具有互相關聯之意義的歷史事件和歷史現象，只有在同一類型的文化歷史類型中，才能被配置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毋庸贅言，無論是羅馬還是希臘，無論是印度還是埃及，歷史上的各個民族，都具有其本身的古代、中世紀和近代的歷史。也就是說，它們和所有的有機體一樣，都具有自己的發展階段，沒有必要將其無條件地、既不多也不少地劃分為三個階段。巴魯耶夫（Балуев, Борис Петрович）對丹尼列夫斯基的著作研

究後，指出：「這不是從歐洲中心論的角度對歷史的觀察，而是站在了宇宙的高度，同時也是從一切宗教結構的角度。」¹⁸ 這一切是丹尼列夫斯基經過認真思考了人類上千年的歷史，而不僅僅是最近或過去的幾百年。¹⁹

在丹尼列夫斯基看來：人類歷史並非是線形進化的發展過程，不存在統一的全人類的文明。各個民族就像活生生的生命有機體一樣，有著自己的出生、成長、繁榮和消亡。這些民族或是形成為文化歷史類型，或是停留在歷史的民族志材料之中。丹尼列夫斯基把文化歷史類型劃分為四個等級：即：宗教、文化和政治及社會經濟。共計 10 種類型，即：1. 埃及 2. 中國 3. 巴比倫—腓尼基 4. 印度 5. 伊斯蘭 6. 猶太 7. 希臘 8. 羅馬 9. 新閃米特或阿拉伯 10. 日耳曼——羅馬或歐洲。²⁰ 並將以上 10 個文化歷史類型運動發展規律概括為 5 個基本法則：²¹

第一，「各民族都具有自身的語言」。依據語言，無需深入考究，便可區分不同的民族類別。這樣的民族，如果能在精神上完成歷史的發展，便可構成本來的文化歷史類型。

第二，政治獨立是文化歷史類型存在、發展的前提。任何一個獨立的文化歷史類型都必須享有政治的獨立性。

第三，「一種文明的根本原則是不能向其文明傳播的。」各文明的產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以往或同時代文明或多或少的影響。

第四，文化歷史類型達到充實、獨立的時候，不同形式的民族將吸引成一個政治實體，即：獨立的聯邦和政治體系。

第五，文化歷史類型的發展過程，類似於多年生一次結果的植物，有著不斷連續性的生長階段，但是相對於開花、結果的階段是暫時的，在其的生命中只有一次，便耗盡了全部的生命力。

18 Б.П. Балуев. Споры о судьбах России. Н.Я. Данилевский и его книга «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 Тверь., 2001. с.90.

19 同上註，с.102.

20 丹尼列夫斯基，《俄羅斯與歐洲》，頁 103。

21 同上註，頁 106-107。

三、丹尼列夫斯基的中國觀及主要成就

(一) 丹尼列夫斯基對中國文化獨特性的認知

1. 對中國傳統文化核心元素的解讀

丹尼列夫斯基對中國的儒家思想有著較為深入的研究。其認識到儒家思想在維護中國社會秩序方面的核心作用，將「仁」「禮」等概念視為中國社會倫理體系的基石。其認為儒家宣導的家庭倫理、社會等級秩序等觀念是中國文化傳承千年的重要紐帶，並且讚賞儒家思想對個人品德修養的重視，如「修身」理念在塑造中國士大夫階層乃至整個社會道德風貌中的關鍵意義。

2. 對中國文化傳承性與穩定性的評價

其深刻地察覺到中國文化具有強大的傳承性和穩定性。儘管歷經朝代更迭、外族入侵等歷史動盪，中國文化的基本框架和核心價值依然得以保存和延續。例如，漢字作為中國文化的獨特載體，其在數千年間的持續使用和演變體現了中國文化堅韌不拔的生命力。丹尼列夫斯基將中國文化的這種穩定性與歐洲文化的多變性進行對比，認為中國文化在世界文明之林中獨樹一幟，是一種獨特的文化類型，有著自身內在的發展邏輯，並非西方文化發展模式的低級階段。

3. 對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的理解

在對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的理解上，丹尼列夫斯基摒棄了西方中心論的觀點。其不認為中國歷史是停滯不前的，而是將其看作是一個有著自身節奏與規律的發展過程。他看到了中國古代王朝的興衰更替背後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在丹尼列夫斯基看來，中國封建王朝在盛世時期的政治清明、經濟繁榮、文化昌盛的內在機制，如唐朝時期的科舉制度對人才選拔的積極作用、絲綢之路貿易對經濟發展的推動以及文化上儒釋道多元融合所帶來的文化活力；同時他也分析了王朝衰落時期土地兼併、政治腐敗、外敵入侵等因素的綜合影響。在其看來，中國歷史的發展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各個歷史時期都有著不可忽視的價值與意義，並且中國歷

史在應對外部挑戰時也有著自身的調適能力，在遭受北方遊牧民族入侵後民族融合與文化交流所帶來的新的發展機遇。

(二) 丹尼列夫斯基對中國政治與社會的看法

1. 對中國政治制度的分析

丹尼列夫斯基對中國傳統的君主專制制度有著複雜的觀點。其看到了中國君主專制制度在維持龐大帝國統一和穩定方面的歷史功績，如高效的官僚體系在國家治理、稅收征管、公共工程建設等方面發揮的積極作用。然而，其也認識到這種制度在近代面臨的困境，隨著西方列強的入侵，中國傳統政治制度的僵化和缺乏適應性逐漸暴露，難以應對外部世界的挑戰。

2. 對中國社會結構的觀察

在社會結構方面，其注意到中國傳統社會以家族和宗族為基本單元的特點。家族在社會經濟活動、教育傳承、社會救濟等方面承擔著重要職能，形成了一種相對封閉但又極具凝聚力的社會網路。同時，其也看到了中國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性，如科舉制度為底層民眾提供了向上流動的管道，儘管這種流動在實際操作中存在諸多限制，但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社會矛盾，維持了社會的穩定運行。

(三) 對中國文化歷史類型的剖析

19世紀中期整個俄羅斯都呈現出複雜化的傾向，一方面是不斷地創新出新的思想文化，另一方面又包含了一些本土特徵，在思想文化上呈現了獨特的時代烙印。無論是丹尼列夫斯基，還是支持俄羅斯走獨立道路的追隨者，與歐洲的普遍中國觀不同，丹尼列夫斯基認為中國是文明和進步的象徵。其反對人類發展的單線理論，認為人類每一個歷史階段都存在著因果聯繫，而非孤立和僵化的存在。從這個觀點出發，亞洲和中國也屬於這個範疇，中國文明在任何方面都不輸於歐洲，而且在某些方面還可能超過歐洲，成為歐洲的榜樣。

丹尼列夫斯基認為東西方文化差異這個概念太籠統，而並沒有真正解讀中國文化的獨特性。其寫道：「世

界上沒有一個民族不關心自己超自然的力量，就像這個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中國，它是真正的東方國家。所以，把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排除在歷史之外是不合理的……至於停滯，這個曾經創造過偉大奇跡的國家與停滯時隔萬里，中國擁有「良好的民眾設施」的概念，中國文明在農業、紡織業、園藝、漁業、藝術、制藥、科學和文學等方面的成就時，丹尼列夫斯基指出，歐洲首先也是因為引進了中國的火藥、指南針、印刷術和造紙術才得以進步。²² 在丹尼列夫斯基看來，「這個國家裏幸福地居住著大約四億人口。假如有關於中國勞動生產力確切數字，我們也許就可以看到，英國和美國的工商業數字是多麼蒼白……中國的農業毫無爭議地佔據著世界的首位……中國的生活在許多方面並不亞於歐洲……中國人早就掌握了火藥、印刷術、指南針和造紙，很可能還是從他們那裏傳入歐洲。中國人擁有龐大的文字資料、獨到的哲學，還有從宇宙學來看自然還很不完備、可是對於一個異教民族而言卻是健全而高超的倫理體系。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像中國那樣高度尊敬和看重科學和知識。……世界上其國家的科學和知識從來沒有像中國一樣得到過如此的尊敬和影響力。」²³

丹尼列夫斯基把中國文明同埃及、亞述巴比倫、印度和伊朗文明一起歸為初級階段或者準備階段，因為即使把它們的宗教、政治、文化和社會經濟結構混合起來，也不能表現出全人類事務的任何一個方面。「中國務實和現實的社會態度並不會給神秘主義的宗教觀點以自由，然而還是存在著宗教和其社會事務的混合：農業就屬於宗教事務。而科學和政治是絕對混合在一起的；比如，科舉考試是進入仕途的唯一方法；天文研究是國家機關的事務等。」²⁴ 由上所知，在丹尼列夫斯基看來，中華文明是獨特文化綜合體，其與西方文化的差異性是毋庸置疑的，是文化一歷史類型的一個「孤獨的」特例。需要指出的是，丹尼列夫斯基對中國的正面評價，為中國文明「正名」和「辯解」的目的也是為了從中國文化

歷史類型來比較其本身的俄羅斯—斯拉夫文明。在丹尼列夫斯基看來，未來取代歐洲日耳曼—羅馬類型的正是以俄羅斯為代表的俄羅斯斯拉夫文明，將在人類未來的歷史中扮演主要角色。

（四）對中國文明停滯的原因分析

與 19 世紀在歐洲普遍認為中國就是野蠻、停滯、落後的代名詞不同，丹尼列夫斯基認為中國是文明和進步的象徵。擁有四億居民的中國在農業、紡織業、園藝、漁業、藝術、製藥、科學和文學等方面都有巨大的成就，歐洲的進步也是基於引進了中國的四大發明才得以實現。丹尼列夫斯基的理論受到自然科學的影響，把中國在 19 世紀的落後看成是正常現象，如同所有自然界的物種一樣，走到了一個衰老的階段。並且中國地處遙遠，中國人口眾多，性格也是離群索居，很少受到外部影響，因此，它是自然死亡。中國「退出舞臺」是自然規律、命中註定，完全不是因為中國屬於「落後」的東方。在丹尼列夫斯基看來，和斯拉夫文明一樣，中國都是具有獨特價值的文化歷史類型。中華文明停滯僅僅在最近的幾個世紀，究其原因在於中國文明地緣的相對封閉性導致與其他文明互動與交流不通。丹尼列夫斯基運用偉大文明從自然產生、發展到滅亡的理論進行反駁，以說明中國文明在諸多文明體系中的特殊存在。「一個民族衰老、死亡、退出歷史舞臺並不取決於其屬於東方還是西方……身體是同樣結實的，在默默地孤獨地生長，積聚了巨大的反抗力量……讓人驚訝的是，在這個機體裏面，青春之火已經變冷，進步的力量已經乾涸。」²⁵ 此外，在丹尼列夫斯基看來，基督教是歐洲文明最重要的歷史組成，它促進了歐洲的進步。與歐洲不同，相比西方基督教變革特性的文明，中國文明是異教與世隔絕的，具有異教的消極性。通過這一對比，丹尼列夫斯基將基督教與「進步」、異教與「衰退」等同起來以證明其觀點合理性。但需要指出的是，丹尼列夫斯基認為中國

22 丹尼列夫斯基，《俄羅斯與歐洲》，頁 39。

23 同上註，頁 74-75。

24 同上註，頁 39。

25 同上註，頁 47。

文明的停滯是由於「地緣的相對封閉性」和「與外部文明互動的不足」，但未進一步討論此觀點的問題所在。此理論的過於簡單化低估了中國在近代變革中的適應力與創造力。對於丹尼列夫斯基「文明停滯」的觀點，存在以歐洲發展模式為隱含標準的潛在偏見。丹尼列夫斯基將中國定義為「單一型文化歷史類型」，強調其孤立性，過於強調文化的獨立性而忽略了文明之間的融合與互補。

（五）中西方文明之對立

在《俄羅斯與歐洲》一書中，丹尼列夫斯基批判了在 19 世紀下半期占主導地位的歐洲中心論，其中包括當時得到公認的把世界歷史劃分為古代、中世紀和新時期的歷史版圖。丹尼列夫斯基認為這種劃分是非常抽象，沒有實際意義的。丹尼列夫斯基同時也批評了將「進步的」西方和「停滯的」東方對立起來的西方派理論，指出將世界劃分為東方和西方是西歐思維牽強而缺乏根據的構想，反對將俄羅斯歸入這個公式。在《俄羅斯與歐洲》一書中寫道：「西方和東方、歐洲和亞洲被我們設想為某種對立物和極端。西方和歐洲是進步、不斷完善、不斷前進的一極，而東方和亞洲則是停滯、因循守舊、令現代人極為厭惡的一極。這是誰也不會懷疑的歷史公式，一想到自己會被歸入停滯和因循守舊的範疇，正正經經追隨現代科學的每個俄羅斯人就感到不寒而慄。因為不是西方，就是東方；不是歐洲，就是亞洲，沒有中間的位置，沒有歐洲—亞洲、西方—東方；即使這樣的位置存在，那種兩面受擠壓的地位也難以忍受。」²⁶ 對於這種「廢話」，丹尼列夫斯基甚至有爭議地把歐洲納入亞洲的部分……歐洲只不過是亞洲的一部分，它並不比亞洲的其其部分好。」²⁷ 中國文明「就像彌涅爾瓦從丘比特的頭顱中鑽出來那樣，是若干世代從獨立而獨特的智力和體力勞動中逐漸積累的結果」，而這恰好就是進步。因此，對於主張俄羅斯走獨立自主道路的人而言，中國在 19 世紀成了有可能實現不同於歐洲的文明和進

步的象徵。²⁸

俄羅斯的中國形象紛繁複雜，社會各階層對中國文明的看法不盡相同，從事有關中國寫作的知識分子甚多，他們的身分、立場、觀念差異非常大，比如在文化選擇上就有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爭等。除此之外，俄羅斯反西方派對中國的看法也是五花八門，雖然表現為對中國都有正面的評價，但他們的觀念、宗旨和社會思想基礎都大相逕庭。歐洲啟蒙運動者認為，中國的開明專制制度是時代的榜樣，它可以推動歐洲以科學和教育為基礎世俗文明的發展。俄羅斯的反西方派則相反，認為中國文明證明存在可供歐洲選擇的，以另一些價值觀為基礎的發展道路。這種觀點和當時流行的歐洲中心論思想，特別是認為東方停滯不前的觀念密切相關。即使是歐洲中心論的反對者丹尼列夫斯基，也不曾批駁過歐洲文明在多數領域中佔有優勢的思想。歐洲文明並非在一切方面都超過中國文明，相反還在某些方面落後於中國文明。反西方派對中國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是俄羅斯特殊性的繼續，與俄羅斯地緣政治息息相關。在俄羅斯民族自我意識驅動下，不約而同將中國衰朽帝國的形象流露出來，這實際上是為論證俄羅斯國家戰略擴張提供合法性。

四、丹尼列夫斯基中國觀的歷史評估

丹尼列夫斯基的中國觀雖在 19 世紀的俄國思想界具有獨特性，但從現代學術視角審視，存在諸多局限性。對中國歷史發展、文化特質及國家發展潛力的認知存在片面、偏差與失誤之處。這些局限性源於當時歐洲中心主義思潮、資訊獲取有限等時代背景因素，以及其文化歷史類型學說固有缺陷、自身學術視野局限等個人思想體系因素。其中國觀對當時俄國及西方對中國的認知與政策產生了一定影響，同時也為當代跨文化交流與認知提供了重要啟示。

26 弗·盧金，劉卓星、趙永穆等譯，《俄羅斯熊看中國龍：17-20 世紀中國在俄羅斯的形象》（重慶：重慶出版社，2007），頁 68-69。

27 丹尼列夫斯基，《俄羅斯與歐洲》，頁 42。

28 同註 26。

（一）主要成就

1. 學術研究領域的貢獻

丹尼列夫斯基的中國觀打破了當時西方主流文化對中國的片面認知模式。其觀點為俄羅斯乃至歐洲知識界提供了一個更為全面、深入且相對客觀的中國形象，促進了俄羅斯與中國之間的文化相互理解。其著作和思想成為兩國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橋樑，激發了更多人對中國文化的興趣與研究熱情，推動了跨文化交流在學術、藝術、文學等多個領域的展開。在學術研究上，其中國觀為後來的東方學、比較文化學等學科的發展奠定了一定基礎。其對中國文化獨特性的強調促使學者們更加重視非西方文化的研究價值，不再將西方文化模式作為唯一的研究參照系。其對中國文化與俄羅斯文化、歐洲文化之間異同的比較分析，為文化比較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案例和理論思考方向，啟發了後世學者從多元文化視角構建更加完善的世界文化理論體系。

2. 對國際關係理論構建的意義

從國際關係理論角度看，丹尼列夫斯基的中國觀豐富了地緣政治和國際關係理論的內涵。其在思考俄羅斯與中國關係以及中國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時，提出了一些超越傳統歐洲中心論的觀點。其認為不同文明國家之間的關係不應僅僅基於西方列強的殖民模式或霸權邏輯，而應尊重各自的文化特性和發展道路，這種觀點在一定程度上為當代國際關係中的多元文化主義、文明平等對話等理念提供了思想先驅，對構建更加公正、平等、包容的國際關係理論具有積極的啟示意義。

首先，多元文化視角的引入。丹尼列夫斯基的理論有力地衝擊了歐洲中心主義在國際關係理論中的主導地位。在他之前，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往往將歐洲模式視為普世模式，忽視了其他文明的特殊性。他的文化歷史類型學說促使學者們開始關注非西方文明在國際關係中的角色和地位，認識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國家有著不同的國際關係理念和行為方式。其觀點為跨文化國際關係研究提供了理論框架。學者們開始研究不同文化歷史類型之間的差異和共性，探討文化因素如何影響國家的對外政策、外交行為和國際合作。通過比較研究中國文化和

西方文化對國家間關係的不同理解，能夠更好地理解跨文化背景下的國際衝突和合作的根源。

其次，對國際關係動力機制的新理解。丹尼列夫斯基強調文明自身的發展動力，這使國際關係理論的研究重點從單純的外部因素（如軍事力量、經濟利益）擴展到文明內部的因素。一個國家的對外行為可能受到其文明內部價值觀、社會結構和歷史傳統的影響。比如，一個有著強烈集體主義文化傳統的國家在國際合作中可能更注重集體利益和共同目標，而不是個體利益的最大化。他提出的文明間互動與競爭的觀點豐富了國際關係的互動模式。除了傳統的政治、經濟互動，還包括文化的交流、碰撞和融合。這種多元互動模式有助於更全面地理解國際關係的動態變化。文化交流可以增進國家間的相互理解，減少誤解和衝突；而文化競爭也可能引發國家在意識形態等領域的對抗。

3. 對俄羅斯漢學發展的貢獻

丹尼列夫斯基的中國觀在中俄文化交流史上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丹氏的著作與言論引起了俄羅斯社會對中國文化的廣泛關注。在他的影響下，更多的俄羅斯學者開始投身於中國文化研究領域，進一步促進了俄羅斯漢學的發展。例如，他對中國文化獨特性的闡述激發了俄羅斯年輕學者對中國語言、文學、哲學等方面的深入探究欲望。一些俄羅斯高校開始增設與中國文化相關的課程，培養了一批批專業的漢學人才。同時，他對中俄文化關係的積極展望也為兩國在文化交流專案的開展上提供了理論支持，如文化展覽、學術研討會、留學生交換等專案在一定程度上都得益於他的思想宣導，使得中俄文化交流在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逐漸走向深入與多元化。

首先，拓寬研究視角。丹尼列夫斯基打破了俄羅斯以往漢學研究僅關注中國語言、文學和歷史事件的傳統局限。他的文化歷史類型學說促使俄羅斯漢學研究從單一的學科視角向跨文化、跨學科的視角轉變。漢學家們開始將中國文化放在世界文化體系中進行考量，研究中國文化與其他文化的相互關係和相互影響。他引入了文化比較的視角，使得俄羅斯漢學研究更加注重比較中國文化與俄羅斯文化以及其他西方文化的異同。這種比較

研究有助於發現中國文化的獨特之處，也有助於理解不同文化之間交流和融合的可能性與障礙。例如，在研究中國和俄羅斯的宗教文化時，通過比較東正教與佛教、道教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能夠更好地把握中俄兩國文化的宗教維度。

其次，激發學術討論。丹尼列夫斯基關於中國文化「停滯」的觀點引發了俄羅斯漢學界的激烈討論。許多漢學家開始重新審視中國文化的發展歷程，通過深入研究中國歷史的各個時期，發現中國文化其實是在動態變化的。例如，他們研究中國近代化的進程，發現中國在面對西方衝擊時並非毫無反應，而是積極地進行了諸如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等一系列變革嘗試，這與丹尼列夫斯基的觀點形成鮮明對比，從而推動了俄羅斯漢學界對中國文化發展動力的研究。他的思想也促進了俄羅斯漢學界對中俄關係的討論。從文化層面探討中俄關係的歷史演變和未來走向，思考中俄兩國文化差異和共性對雙邊關係的影響。例如，在研究中俄邊境地區的文化交流時，漢學家們分析了文化因素在促進或阻礙經濟合作、民間交往等方面的作用，為中俄關係的健康發展提供了文化層面的參考。

最後，培養學術氛圍，吸引更多學者關注漢學。丹尼列夫斯基的理論具有一定的爭議性，這種爭議性吸引了更多俄羅斯學者關注漢學領域。無論是支持還是反對他的觀點，學者們都開始投入精力去研究中國相關的問題。這使得俄羅斯漢學研究隊伍逐漸壯大，為俄羅斯漢學的持續發展提供了人才基礎。在對丹尼列夫斯基觀點的批判和繼承過程中，俄羅斯漢學家們不斷創新研究方法和理論。他們不再局限於傳統的研究思路，而是嘗試運用新的理論框架和研究手段來研究中國。例如，在研究中國文化傳播時，借鑑文化傳播學的理論和方法，從跨文化傳播的角度分析中國文化在俄羅斯的接受和影響情況。

在俄羅斯漢學發展方面，丹尼列夫斯基的貢獻不可磨滅。他的研究方法與視角為俄羅斯漢學研究開闢了新的道路。他強調從文化整體觀的角度去研究中國，打破了以往漢學研究中單一學科研究的局限。他對中國文化與俄羅斯文化關係的深入思考也促使俄羅斯漢學研究更加注重比較文化研究。例如，在他之後的俄羅斯漢學

家在研究中國文學作品時會更多地與俄羅斯文學進行對比分析，從文學主題、人物形象塑造、文學審美等多方面尋找異同點，從而加深對兩國文學的理解。丹氏的思想還影響了俄羅斯漢學研究的學術氛圍，鼓勵學者們突破傳統思維定式，積極吸收國際上先進的研究理念與方法，使俄羅斯漢學在世界漢學領域逐漸嶄露頭角，形成了具有俄羅斯特色的漢學研究體系。

（二）局限性

丹尼列夫斯基作為 19 世紀俄國重要的思想家，其在文化歷史類型學說中對中國的認知與評價，雖在當時具有一定的影響力，但從現代多元視角審視，存在諸多局限。

1. 對中國歷史發展認知的片面性

首先，忽視中國歷史發展的階段性變革。丹尼列夫斯基簡單地將中國歷史歸結為迴圈停滯，完全忽略了中國歷史上諸多重大的階段性變革。諸如，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經歷了從奴隸制向封建制的深刻轉變，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商鞅變法推動秦國建立起新的土地制度、軍事制度和官僚體系，為秦統一六國奠定基礎，這一變革對中國歷史走向產生了深遠影響。又如，唐宋時期，中國的經濟重心南移，商業經濟蓬勃發展，城市興起，市民文化繁榮，科技領域更是取得了眾多領先世界的成就，如活字印刷術、指南針等發明，這些都表明中國歷史並非一成不變的迴圈。丹尼列夫斯基將中國文化的獨特性等同於文化孤立，未能認識到文化獨特性是在與其他文化交流、融合過程中形成的。中國文化在保持自身核心價值觀和傳統的基礎上，不斷吸收外來文化的精華，實現自身的發展與創新。例如，中國的建築藝術在吸收了佛教建築風格後，發展出了獨特的寺廟建築形式，既保留了中國傳統建築的特色，又融合了外來文化元素。

其次，誤解中國歷史發展的動力機制。沒有認識到中國歷史發展有著自身獨特的動力機制。中國歷史的演進並非僅僅由政權更迭驅動，經濟基礎的變動、文化思想的傳承與創新、民族融合等因素都在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例如，中國古代的土地制度變革，從井田制到均

田制的演變，深刻影響了社會經濟結構和政治格局。而佛教傳入中國後，經過長期的本土化融合，對中國的哲學、文學、藝術等領域產生了巨大影響，推動了中國文化的豐富與發展。丹尼列夫斯基未能深入探究這些內在動力，簡單地將中國歷史發展視為停滯，顯然是不準確的。丹尼列夫斯基低估了中國古代經濟的開放性。除了絲綢之路，中國在海上貿易方面也有著悠久的歷史。唐宋時期，中國的海上貿易蓬勃發展，與東南亞、南亞、中東乃至非洲等地都有廣泛的貿易往來。中國的瓷器、絲綢、茶葉等商品遠銷海外，同時也進口了大量的香料、珠寶等物品。明清時期雖實行過海禁政策，但在某些時期仍有民間走私貿易存在，且官方貿易也並未完全斷絕。這些都表明中國經濟並非完全自給自足、孤立於世界經濟體系之外。

2. 對中國文化特質理解的偏差

首先，對儒家思想的片面解讀。丹尼列夫斯基對儒家思想的認識過於片面，僅強調其保守、等級的一面。實際上，儒家思想是一個豐富多元的體系，其中蘊含著積極的價值觀念與人文精神。儒家宣導的「仁」，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愛與尊重，這一理念對於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要意義。儒家的教育思想，如「有教無類」，打破了階級界限，為社會培養人才提供了可能。而且，儒家思想在不同歷史時期也不斷發展演變，如宋明理學在吸收佛道思想基礎上對儒家經典進行新的闡釋，展現出強大的生命力與適應性，並非如丹尼列夫斯基所認為的那般僵化保守，同時，對中國文化創造力的低估，嚴重低估了中國文化的創造力。中國在藝術領域，從古老的青銅器、陶瓷到書畫藝術，都展現出獨特的審美與創造力。中國的繪畫藝術，無論是早期的顧愷之、閻立本，還是後來的吳道子、趙孟頫等，其作品風格各異，不斷創新發展。在文學方面，從《詩經》《楚辭》到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中國文學形式豐富多樣，作品層出不窮，對世界文學發展都產生了一定影響。在科技領域，除了四大發明，中國古代在天文、曆法、醫學等方面也取得了眾多成就，如《黃帝內經》《傷寒雜病論》等醫學著作，為人類醫學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丹尼列夫斯基僅依據中國近代科技發展的相對滯後，便否定中

國文化整體的創造力，是不客觀的。

（三）局限性的產生根源

1. 時代背景的限制

首先，歐洲中心主義思潮的影響。19世紀，歐洲在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佔據主導地位，歐洲中心主義思潮盛行。丹尼列夫斯基雖試圖突破西方傳統的歷史哲學框架，但仍深受這一思潮影響。在歐洲中心主義觀念下，以西方的發展模式與價值標準來評判其他文明成為常態。西方將自身的工業化、民主化進程視為文明進步的唯一標準，而中國在近代因未能及時走上類似道路，便被視為落後、停滯的代表。丹尼列夫斯基在這種思潮氛圍中，不可避免地對中國的認識產生偏差，以西方視角去解讀中國歷史與文化，忽視了中國自身發展的獨特性。其次，資訊獲取的有限性。當時，俄國與中國的直接交流相對有限，丹尼列夫斯基對中國的瞭解主要依賴於西方傳教士、商人等的著述以及少量俄國旅行者的見聞。這些資訊來源往往存在片面性與主觀性。西方傳教士出於傳教目的，可能會對中國文化進行有選擇的描述；商人則更關注商業利益，對中國社會文化的認識較為膚淺。而俄國旅行者的記錄也因個人經歷與觀察角度的局限，難以全面準確地反映中國的真實面貌。有限的資訊獲取管道使得丹尼列夫斯基難以形成對中國全面、客觀的認識。

2. 個人思想體系的局限

首先，文化歷史類型學說的固有缺陷。丹尼列夫斯基的文化歷史類型學說雖具有創新性，但存在一定的機械性與簡單化傾向。他將複雜的世界文明發展簡單地歸結為不同類型的生命週期，這種類比生物有機體的方式忽略了人類社會與文化發展的多樣性和複雜性。在這一學說框架下，對中國的分類與評價過於僵化，未能充分考慮到中國歷史文化發展過程中的特殊性與多樣性。例如，中國文化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間存在著豐富的差異，不能一概而論地以「停滯型」來簡單概括。其次，自身學術視野的局限。丹尼列夫斯基主要立足於俄國的地緣政治與文化發展需求來構建其思想體系，學術視野相對局限於俄國與歐洲的關係以及俄國在世界中的

地位。他對東方文化的研究缺乏深入的實地考察與系統的學術研究，更多地是從理論層面進行推導與判斷。這種缺乏對中國文化深入理解的學術視野，使得他在構建中國觀時，難以準確把握中國文化的精髓與中國歷史發展的脈絡，從而導致其中國觀存在諸多局限性。

綜上所述，丹尼列夫斯基的中國觀是其所處時代背景與多元思想淵源共同作用的結果。其對中國文化、政治、社會等方面的認知既具有一定的時代局限性，又有著超越當時主流觀點的創新性與前瞻性。其中國觀在跨文化交流、學術研究以及國際關係理論構建等多方面取得的成就不可忽視，為我們今天深入理解中俄文化關係、中國在世界歷史中的地位以及多元文化相互作用等提供了寶貴的歷史資源與思想借鑑，也促使我們在當代全球化語境下繼續深入探索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與合作模式。丹尼列夫斯基的中國觀猶如一座橋樑，連接起了19世紀俄羅斯與中國在思想文化領域的交流與互動。其

憑藉著對多元思想的融合與獨特的思考視角，深入挖掘中國文化的精髓，打破了當時西方中心論主導下對中國片面且僵化的認知模式。丹氏中國觀不僅豐富了俄羅斯本土的文化思想寶庫，也為俄羅斯漢學的茁壯成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更為中俄兩國文化交流的持續深化奠定了堅實基石。

在當今全球化浪潮洶湧澎湃的時代背景下，丹尼列夫斯基的思想遺產愈發彰顯出其珍貴價值。其對不同文化平等性的尊重以及對跨文化交流互補性的深刻洞察，提醒著當代人在處理國際關係與文化交往時，應摒棄文化偏見與傲慢，積極促進多元文化間的對話與合作。丹氏的研究成果是一面鏡子，映照出文化交流在歷史長河中所發揮的巨大影響力，也激勵著後世學者繼續沿著跨文化研究的道路前行，進一步探索不同文化間的奧秘與聯繫，為構建一個包容、和諧、多元共生的全球文化生態貢獻智慧與力量。

《漢學研究通訊》專論徵稿

《漢學研究通訊》創刊於1982年，每年出版四期。旨在報導臺灣地區漢學研究、教學、活動、資料等項訊息，並兼及中國大陸、海外地區各地漢學研究訊息，發行遍及海內外約50個國家及地區。徵求專論文章，主題範圍如下：

1. 漢學相關學科研究成果綜述
2. 漢學研究新視野及計畫
3. 國際漢學機構介紹
4. 中外著名漢學家傳略、業績與貢獻
5. 學人訪談

來稿均送請專家學者審查，經採用刊登，即按相關規定致贈稿酬。園地公開，歡迎海內外學者賜稿。投稿請寄電子郵件至：ccsnews@ncl.edu.tw。相關稿約及寫作格式詳見<https://ccs.ncl.edu.tw/g0107/publish2.aspx>